



● 作者/Mercy Kuo ● 譯者/趙炳強 ● 審者/馬浩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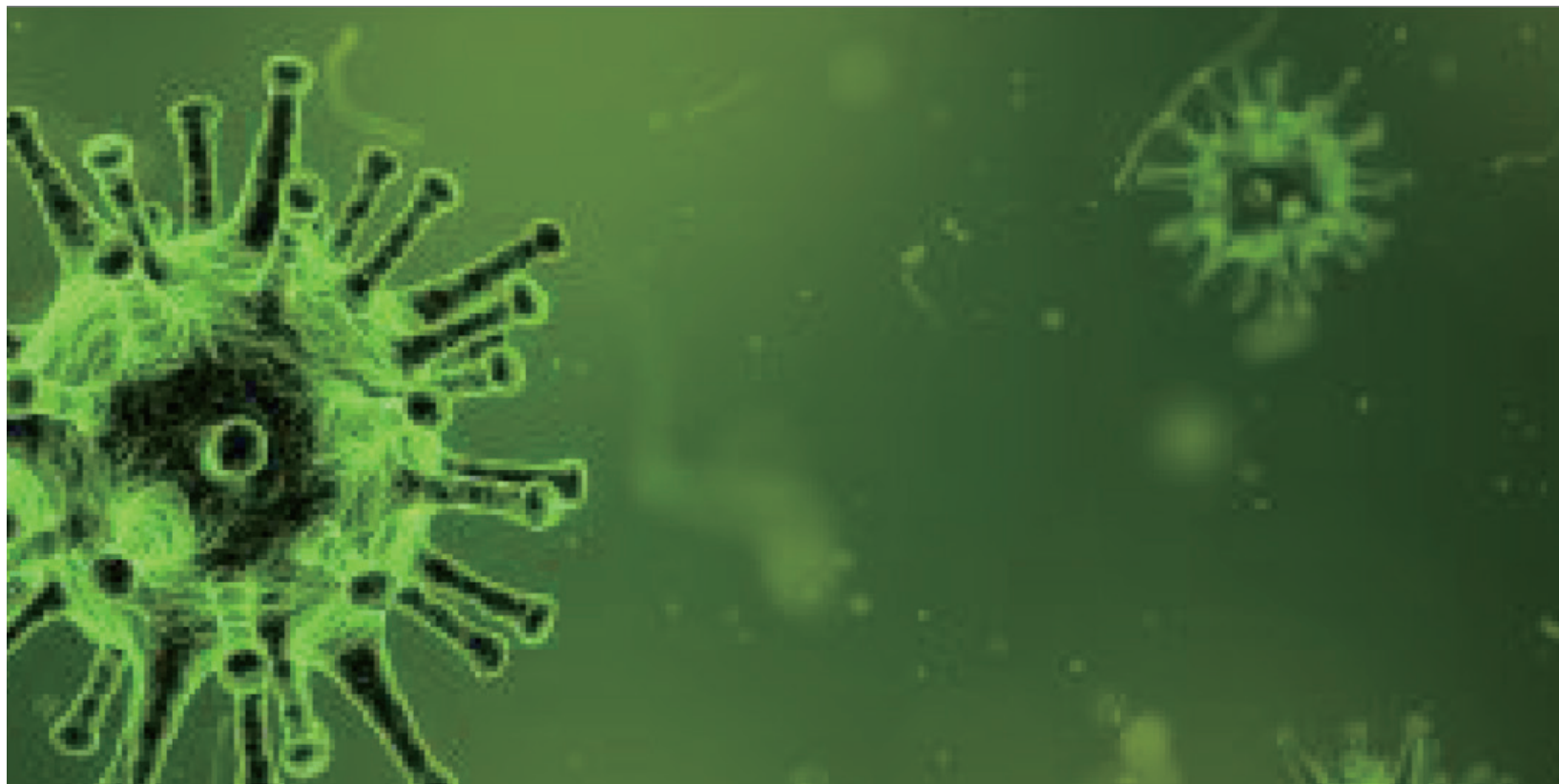


中共與新冠肺炎

Investigating China: COVID-19 and the CCP

取材/2020年5月19日外交家網站專文(*The Diplomat*, May 19/2020)

「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世界各國不斷質疑中共與世界衛生組織(下稱「世衛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之應處作為。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國際壓力，中共再次發揮其宣傳與操弄輿論之能力，企圖扭轉世人對其防疫不力之指控。



中共醫療介入與服務的決策 機制與授權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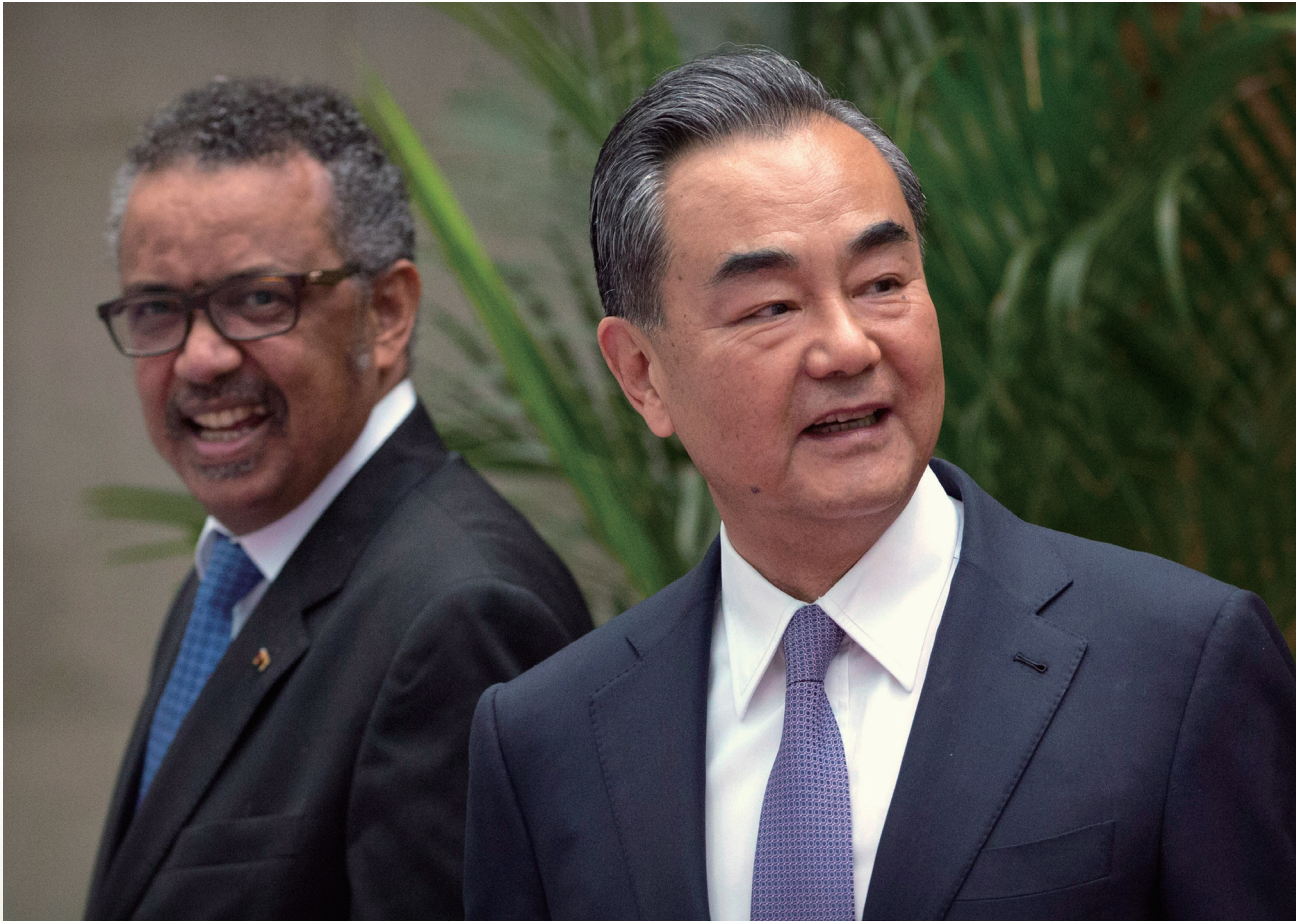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2003年的爆發，揭露了中共醫療體系的嚴重缺陷，民眾對難以負擔且品質低落之醫療服務的抱怨也日益增加；此後，中共當局體認到，有效率的醫療體系，對其整體社會和經濟發展、國家穩定，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正當性，甚至中共在世界舞臺的形象而言，均

至關重要。2009年，中共中央委員會以及國務院明令進行重大醫療改革。此「健康中國戰略」目標係建立一個公平有效的醫療體系，讓中共在2020年實現「全民健康」的目標。欲達成之，需加強醫療照護服務、衛生安全和基本藥物供應。

中共在政府最高層的國務院成立了「國務院衛生體制改革辦公室」，以負責協調相關部門來制定具體的改革政策。該

辦公室也負責評估不同部會以及各省改革工作。然而此項年度評估卻將直接影響國家衛生補助金的分配以及個人晉升，因此該辦公室和負責制定國家政策的相關部會(例如衛生部)，都對改革戰略的實施未能保有任何實質權力。

時至今日，中共的醫療介入、服務以及財政體系仍不完整。在地方上，分配資源以實施國家級醫療政策，係省級主管機



世界各國不斷質疑中共與世界衛生組織之應處作為。(Source: AP/達志)

關的責任，但這卻可能與當地利益相互衝突。這些主管機關經常認為國家政策只不過是指導方針，而無論是因為缺乏資金、資源還是當地利益等因素，他們都認為自己沒有義務予以執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官員始終盯著更多的國家補助和下次晉升機會，因此總是報喜不報憂，汲汲營營向在北京的頂頭上司展示特定地區的醫療表現有多優秀，而不願意讓上級看到問題。即使是在國家層級，中共的衛生資源也由不同部門管理，而這些不同部門間的協調也一向是問題重

重。如2003年的SARS和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發的這種危機狀況下，這種分散破碎的情形也嚴重影響了危機處理的執行。

調查中共在國內處理「新冠肺炎」，及其與世衛組織互動，背後國際壓力日益升高之背景因素

最初在中國大陸中部武漢發生的「新冠肺炎」危機，暴露了中共當局在承認任何威脅公衛的疾病爆發方面，始終缺乏透明度。地方和國家均不

願以官方名義報告疫情爆發，也不願承認武漢發生的悲劇，讓這次疫情變成一場人禍。更重要的是，中共不願與國際社會分享未經其審查的資訊，導致部分歐美評論家譴責北京。在美國，一些共和黨要員則利用疫情爆發前大眾對中共日益增長的不信任，發起了一場大規模反中運動，目的是轉移選民注意力，為川普政府在國內流感大流行時的管理不善解套。

在美國對抗「新冠肺炎」的戰爭中，中共被描繪成污染全球其他地區的「零號病人」(Patient Zero)，造成近3,000萬美國人失業的損失，以及聯邦政府數兆美元的緊急支出，不僅美國，甚至全球經濟衰退的加劇，都應該歸咎於中共。在世界各地，因各方利益盤根錯節，人們以不同解釋複製全球大流行的恐怖，中共儼然成為最後的代罪羔羊。例如，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便指責中共造成了全球鉅大的生命損失以及經濟停擺。

在目前中美兩國的外交/防疫戰爭中，世衛組織已然成為雙方在政治與外交攻防上的場域，而這也不是什麼新聞。誠如世衛組織創始成員之一的施思明(Sze Szeming)博士所說，該組織自成立以來，便是一個政治凌駕醫療衛生事業的地方。正如筆者著作中所述，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中共與蘇聯便不斷利用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下稱「世衛大會」)做為政治與外交角力的場合。以中共為例，在其1973年加入世衛組織之後，便開始利用世衛大會推廣其「第三世界」(Third World)的新政策，並與「第一世界」(First World)如美、蘇等「超級強權」國家進行鬥爭。

中共在國內與全球衛生政策控制「新冠肺炎」之正當性與能力，以及在地緣政治的關聯性

縱觀中國歷史，包括瘟疫、戰亂以及饑荒等自然災害，都被視為是統治者喪失「天命」的徵兆，難以避免導致了許多朝代的衰亡。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政治與健康始終密不可分。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血吸蟲病等地方流行病，便被視為對人民生活、社會穩定以及國家安全造成威脅。而意欲消除此類疾病的公衛運動，也將對抗療法(allopathic medicine)和公衛工作，與新秩序的持續合法化連結在一起。對抗疾病成為代表爭取社會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將消滅疾病和改善全體人民健康，做為其政策的核心支柱。由於「改善人民健康」的承諾一直是中共建立政治正當性的主要工具；若該承諾未能



2020年2月8日，在安徽省合肥市某棟大樓外牆展示抗疫電子標語。(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中國大陸長春龍嘉機場在疫情期間實施安檢。(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兌現，也可能損害黨的統治合法性。因此，中共控制「新冠肺炎」的作為也出於政治考量。同時，由於中共的公衛工作已成為衝擊和影響群眾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共也將對抗「新冠肺炎」的政治運動，變成了關乎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運動。中共已經透過此法成功獲得眾多人民支持。

民族主義正在中國大陸興起。同時，隨著疾病蔓延全球以及部分歐美國家排外的反華

論述，中共官宣正在將「新冠肺炎」轉變為一種外部威脅。這使中共得以在聲稱的「統一努力」或「共同目標」中與疾病對抗，進一步獲得其境內和海外華人支持。這種民族主義的言論，也使人們的注意力從武漢的悲劇中轉移開來。

中共官媒利用美國和歐洲日益嚴重的危機，在全球不斷吹噓其在控制疾病方面取得的成功。中共也向義大利等國家派出了醫療團；派遣醫療團到

國外，一直是中共在冷戰時期用來推廣國際新秩序的策略：一種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和反霸權主義的「人民革命運動」。在1970年代，中共與日俱增的醫療「人道主義」活動，以及透過此種事業所建立的友誼關係，使其在與中華民國(臺灣)爭奪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聯合國大會會員席位時勝出，得以代表「中國」參與聯合國。此次，中共的醫療「人道主義」努力再次獲得了世衛組織，

以及那些意欲批判川普政府，或其國內危機處理失敗之人士的讚許。另一方面，儘管健康與人道主義在白宮內的政治和外交談判中都會發揮關鍵作用，並最終促成1970年代初期對中共開放；諷刺的是，目前白宮和北京都利用健康作為新冷戰的武器。

評估中共反制全球呼籲其承擔責任的戰略

由於中共未能向全球通報疫情警告，隨著部分歐美國家施壓的力道日益強大，威脅將其送上國

際法院的氛圍下，中共已成為不受全球信任的國家。面對如此挑戰，中共在其官媒和科學界的幫助下，持續極力試圖扭轉局勢，將自己宣傳為成功遏制疫情的全球英雄。與此同時，北京也啟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以其所謂的科學證據為後盾，指謫係美軍先將這種疾病帶到了武漢。不過這種伎倆也不是頭一遭了，使人不禁聯想起1950年代韓戰期間，中共指稱美國發動「細菌戰」(germ warfare)的手法。另一方面，中共也發起了外交和宣傳運動，透過喚起世人對「百年國恥」的



湖北省武漢市方艙醫院一隅。(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中國大陸北京地鐵站檢疫措施。(Source: Wikimedia Commons/Pau Colominas)

記憶，以攻擊歐美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其中，「新冠肺炎」便是歐美(尤其是美國)用來阻礙中共崛起的新「鴉片毒流」(opium plague)。只是這次，中共擁有不被打敗的決心。

與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情況類似，中共高層做出了以下決策，就是中共將持續對外開放，程度更甚以往。前次鄧小平在其「老朋友」美國前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的協助下，使其擺脫了遭國際孤立的危機；此次習近平則致電給俄羅斯總統普丁，以尋求其同意建立更牢固的關係。普丁聲明：「某些人在病毒起源問題上企圖汙衊中國是不可接受的」，他也向習保證，「俄羅斯已準備與中國在對抗『新冠肺炎』和其他領域繼續進行交流與合作。」

習近平與普丁進行對話的隔天，也就是2020年4月17日舉行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共

宣布將「保障國際物流暢通，對出口防疫物資品質嚴加把關，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就在同一天，武漢當局公布了更新後的死亡率和發病率數據，使該市的「新冠肺炎」的死亡總人數增加了五成，全國死亡總人數則超過了4,600人。官方聲明指出，此次修訂是當局努力「確保全市新冠肺炎疫情資訊公開透明、數據準確」的結果。也剛好在此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發出抨擊，指美國批評中共掩蓋事實之指

控不實；他表示：「我們絕不允許任何隱瞞。」顯然，這次新的統計行為，係中共為阻止外部批評而精心策劃的行動。同時，中共當局也希望透過大幅提高的死亡率數據來贏回眾人信任，從而確保國家穩定。

既然美國和歐洲的決策者都質疑中共衛生政策和資料透明度的可信度，為何中西科學家和衛生專家間的合作仍對遏制「新冠肺炎」至關重要？

在過去四十年中，為了將中共納入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歐美已做出了極大努力。歐美國家拉中共入夥的熱情，也切合中共參與其中的意願。不過，在中共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快速的現代化、無限制的濫伐和規模空前的都市化，均已

威脅中國大陸生態系統的承受和復原能力。從農業的擴張和集約化(包含因生活水準提高,生產供人民食用之高蛋白食品的畜牧業),到公路、鐵路、採礦,和諸如三峽大壩等其他大規模的現代化計畫,這種不斷增長的土地開發,迫使許多喪失棲地的野生動植物侵入人口稠密區,並導致牲畜與野生動植物之間緊密融合,提高威脅大眾健康之新病原體接觸人類的機率。

長江以南,包括武漢周邊地區以及中國大陸西南部已然形成一個「金三角」地帶,成為出現及傳播諸如SARS、高病原

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和新冠肺炎等大量新興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EID)的理想環境,而這些疾病也都是經由人畜共通途徑開始傳染。然而,在這方面中共並不孤單;如今正在世界流行的各種傳染病,中共也並非是唯一禍首。縱觀歷史,現代化、全球化與流行病之間的關聯顯而易見。全球貿易的擴張和旅遊使人們得以自由行遍天下,但也使眾人暴露在危險之中,還變得更加脆弱。一度隔絕你我、同時減緩傳染病傳播速度的地理藩籬,也由於交通網路的改善而失去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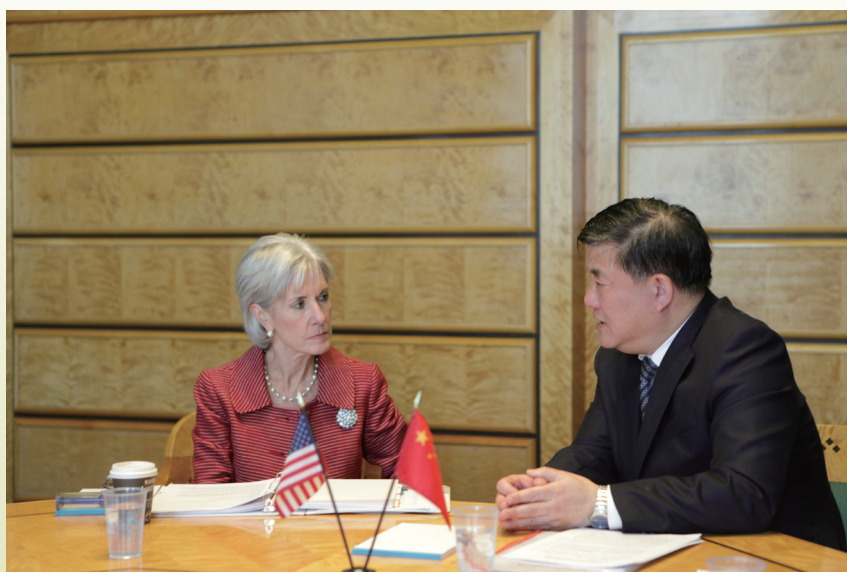
用。

今日中共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一樣,搭飛機就像趕公車一樣普遍且方便。技術改善和班次增加的航空業更加速了疾病傳播,一如「新冠肺炎」這種疾病快速大流行。萬事萬物在當前時空下的聯結性,不僅是地理上接近而已,也代表科學不能只考量獨立個案及其影響。在更嚴重的緊急狀況和需求出現之前,吾人須比以往更深入瞭解傳染病的肇因和傳染方式與途徑,也需要國際機構與各國政府之間更密切合作,與全球、跨領域科學與衛生專家共同努力,從國家、區域與國際層級之角度,強化動物與公共衛生之監視、應處、預防以及準備體系。

作者簡介

Mercy Kuo 係帕米爾顧問公司(Pamir Consulting)策略服務部門副理,同時為外交家網站專欄作家。本文係作者與英國艾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副教授周遜(Xun Zhou)博士,針對「新冠肺炎」(COVID-19)起源與中共醫療系統之未來的討論內容。

Reprint from *The Diplomat* with permission.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前部長瑟比莉亞(Kathleen Sebelius)與中共代表在世界衛生大會晤談。(Source: United States Mission Geneva/Eric Bridiers)